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 ——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
【文革一幕】	陆平、彭珮云是怎么“解放”的	钱江
【荒唐年代】	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黄华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  
——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 董国强 •

内容提要：早在20年前，学界关于“文革”群众运动的理解已经逐渐形成某种定式。一些新近出版的相关论著，并未对原有的解释体系形成有效突破。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系统追踪，重新反思了地方派性因素的成因和“文革”动乱长期持续的动力，较为深入地阐释了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的内在关联。与早先那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论著相比，本文的考察时段不仅涵盖1966—1968群众运动高潮时期，而且涵盖“文革”后期的几年；考察对象不仅限于学生群体和工人群众，而且包括先后卷入群众运动的地方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群体。考察范畴不仅限于地方群众运动，而且涉及北京高层政争。笔者认为，无论从精英政治层面还是从群众运动层面看，“文革”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文革”发动者和所有参与者对“革命”话语的策略性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文革”派性斗争的本质属性。

1966年初夏在中国大陆爆发并持续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因波及范围广、卷入人数多、造成破坏大，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成因和发展过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在中国国内，中共中央于1981年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然而其对“文革”动乱成因的简单解释却难以让人信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禁限，长期以来学界将“文革”研究视为畏途，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不多，整体上水平不高，很难形成新的系统性的认知。在西方学界，自1970年代初开始，迁延至1990年代末，曾经兴起一波“文革”研究热潮，相继出版了一大批有关论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以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的政治学研究论著异军突起。这些研究论著摆脱了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窠臼，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存在于社会基层、内容更为广泛的群众派性斗争，使得相关研究别开生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些研究而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很快成为西方学界认知与解释“文革”运动的主要理论框架。不过近十多年来，西方学界的关注焦点日益转向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闻

题。新的“文革”研究史料的大量涌现，并未引起他们重新反思“文革”研究的兴趣。因而，“文革”研究在西方也呈现出停滞不前的趋势。

本文的后续内容将会揭示，无论过去国内外学界在“文革”研究领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我们对这一复杂历史事物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还相当肤浅。有些理解和解释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莫名的恐惧，往往源于无知。只有正视历史事实，廓清各种错误认识，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才有可能期待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 一、关于江苏 / 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实证研究的概述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议题。要想在相关研究中别开生面、推陈出新，就必须选择适当的方法和路径。在笔者看来，“文革”研究至少可以被切割为“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两个剖面。如果借用“蝴蝶效应”的比喻，“精英政治”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与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扇动他的翅膀；“群众运动”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与解释，蝴蝶翅膀所扇起的微风，通过怎样的机制不断被放大，并最终形成一场破坏力极大的龙卷风暴。

在过去的几年中，笔者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Andrew G. Walder 合作，对江苏 / 南京地区的“文革”群众运动进行专题研究。由于学术训练的微妙差异和各种条件的制约（主要是档案资料的欠缺），我们的研究实际上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资料包括“文革”期间中央和地方报刊、当地群众组织出版物和各种传单、“文革”后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地方史志资料、众多重要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众多公开出版或自印发行或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回忆录文字、以及许多已发表的中英文研究论著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通过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深度访谈所获得的一大批口述历史资料。这些口述资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然而却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使我们有可能对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度解读。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了6篇系列论文（详见后文注释），第7篇论文也已经被 The China Quarterly 正式接受，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发表。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外部因素对当地群众运动的影响——即每当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在南京当地会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然而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地方性因素对群众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的巨大影响绝不应受到低估。例如，1966年夏天当地“文革”群众运动的爆发，与此前的地方政治生态和各单位内部的矛盾冲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对相关的历史背景缺乏必要的了解，就无法理解当地的“文革”群众运动缘何一哄而起。再例如，在持续十年的时间里，全国“文革”运动的整体走势多次发生逆转。每当此时，此前当地业已存在的派性阵营和个人派性身份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现实处境，从而内在的制约着他们做出新的政治抉择。此外，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根深蒂固的派性因素的影响下，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往往从实用主义的考量出发，对中央的指示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诠释和发挥，从而使得中央的意图无从实现。

对地方性因素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央权威的存在。不可否认，“文革”期间中央每一个重要指示发出后，一定会在当地迅速引起反响。不过这种反响的结果是否会如中央所愿，则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观察是，只有在中央的指示十分简单、具体、明确，没有任何再度诠释的空间时，才会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然而由于中央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滥用，实际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此。

由于我们一直系统地追踪当地“文革”群众运动的发展，对各种政治势力如何逐渐卷入派性斗争的过程及其他各自的利益诉求较为熟悉，因而在探讨一些重要问题时，常常能够追根

溯源、见微知著，揭示出一些前所未见的维度与层面，从而深化与拓展了国内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现有认知。例如，对于1976年春天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或者概念范畴更为宽泛的“四五运动”），严家琪和Genny Louie等人早在1980年前后就有关专题论著发表。（1）后来，Sebastian Heilmann和吴雪晴、程中原等人又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2）尽管相隔多年，这些论著的叙事方法和认知体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它们考察的时段，都局限于1976年1—4月间；它们对两个事件的定性，都是基于义愤的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它们的表述逻辑，似乎都可以归纳为“好人”与“坏人”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然而如果将1976年春夏全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政治事件所折射出的更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格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更为复杂的事物属性。以“南京事件”为例，至少反映出三种相互交织、十分微妙的政治关系：第一，正如一些现有论著所言，是数以千万计自发卷入抗议示威活动的干部群众与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四人帮”之间的对抗关系。第二，是当时的省市主要领导（如彭冲、许家屯等人）与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是当地原造反派头头（如曾邦元、华林森、孔庆荣等人）与省市主要领导、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一些关系，似乎很难用“好人”/“坏人”、“正义”/“邪恶”之类简单的价值判断一言以蔽之。以下，本文将追根溯源，深度解释这些关系——尤其是后两种关系——的来由与微妙之处，向读者展现“文革”派性问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 二、派性身份与派性冲突：十年考察

同全国各地一样，南京地区的群众派性斗争肇始于1966年夏秋，当时的派性分野一般可以被归纳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范畴。派性斗争首先产生于各基层单位内部，而后逐渐形成全市性的派性组织联盟。最初卷入派性斗争的主要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各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以及其他较为低端的社会成员。随着1966年下半年中央的舆论导向日趋激进，地方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结构性的转换：原先占据数量优势的“保守派”阵营日益式微，而原先屈居少数地位的“造反派”阵营则日益强大。（3）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在当地引起连锁反应，“夺权”成为新的群众运动主题。在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垮台前，保守派势力因失去庇护而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与对抗并未就此停息，而是被新的派性冲突与对抗所取代：原来同属于“造反派”阵营的“省红总”和“八二七”，围绕由谁主导“夺权”以及“夺权”后的权力分享问题产生龃龉，并进而发展为公开的分裂与对抗。（4）在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夕，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一大批省市机关中的中下层干部（副处长以下）和一般工作人员开始卷入群众派性斗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愿成为行将垮台的省市领导人的牺牲品，纷纷加入“造反派”阵营，其派性组织有省市“省革总”和“市革总”。“一·二六夺权”以后，由于“省红总”和“八二七”公开分裂，省市机关造反派群体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另立山头组成“大联合总部”和“省革总新总部”，站在“八二七”一边。（5）

南京“夺权”后的派性对抗与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1967年2月初，中央指示有关各方组成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打算通过协商方式迅速产生过渡性权力机构。然而历时一个月的谈判，因当地两派的尖锐对立和中央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3月初，中央宣布由南京军区在当地实施“军管”。这个决定再次引发当地群众派性组织的分化与重组，但基本格局依然是“省红总”和“八二七”之间的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由是否支持“夺权”转向是否支持“军管”——“八二七”成为“拥军派”，“省红总”成为“反军派”。“军管”初期，军方依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桀骜不驯的“省红总”实施“镇

反”，通过高压威慑很快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然而4月份以后中央舆论导向的急遽变化，使得军方的权威遭受质疑。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省红总”在当地发起“倒许”运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此同时，“省红总”与“八二七”的派性冲突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春夏当地群众派性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近百名厅局级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原省市书记处成员）和军队高级干部也逐渐卷入派性斗争——他们必须在尖锐对立的群众派性冲突中选择自己的立场。“武汉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和南京军区空军、江苏省军区以及当地军事院校的高层领导受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舆论宣传的误导，一度公开与“省红总”结盟，成为“反许”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南京“军管”当局才没有垮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暴力冲突也受到暂时遏制。（7）

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步演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群众派性斗争中。因而，“文革”派性斗争绝不仅限于社会基层和普通群众（如学生、青年教师、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内部，而是涉及到地方各级党政军部门及其领导人。

1968年春实现“大联合”以后，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卷入派性冲突的主要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大群体。新的派性身份和派性斗争格局，与“大联合”中“三结合”模式有关。在此后的三年中，江苏/南京地区的派性斗争具体表现为军方势力渐次利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对1968年“大联合”期间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地方老干部和原造反派头头实施打压和清洗，最终实现由军队干部大权独揽的军方独裁统治。（8）

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最高当局有意让军方势力退出地方事务，重建由党政干部主导的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在有些省市，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因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立即遭到清洗。在其他一些省市，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在稍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垮台。而在“文革”初期遭遇灭顶之灾的地方老干部群体东山再起。江苏/南京的情况属于后者。在1974年，一直受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党政干部群体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遭到清洗的原造反派头头们联手，借助“批林批孔”运动的东风，打着“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旗号，动员其他社会力量一举推翻军方的统治。然而以彭冲、许家屯为首的老干部群体在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转而对试图重返权力殿堂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实施打压。原造反派头头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摘掉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却无缘恢复其在1968年“大联合”中取得的政治地位。这为以后新的派性冲突埋下了伏笔。（9）

1975年春夏，在“林彪事件”后与许多老干部一同复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施全面整顿。其重建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努力值得肯定，但由于对地方派性问题的成因和性质缺乏深入了解和正确认知，所谓“全面整顿”以强力打压原造反派头头为主要内容和手段，因而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就江苏/南京而言，以下两个新情况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生事物”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也是特定的历史语境使然。他们在“军管”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事后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包括经济补偿和恢复其在“大联合”期间取得的象征性的政治地位，于情于理并不为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不顾他们的现实处境与个人诉求，继续对他们实施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清洗和打压，其结果必然是从反面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造反派”身份认同。几乎所有南京“省红总”和“八二七”的重要头头，都在1970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审查和清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刑讯逼供死于非命，一些人因长期监禁精

神异常，但大部分人都得以幸存。然而在1974—75年“五一六”问题平反后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受到明显的歧视——许多人被降职任用，还有许多人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这样的处置办法，在全面整顿期间得到中央高层的明确支持。相同的个人处境，使得原有的两派身份认同逐渐被统一的“造反派”身份认同所取代。他们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时刻准备着为改善其自身处境而放手一搏。（10）

第二，出于大致相同的背景和原因，省内各地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在全面整顿前后频繁串联，逐渐形成了反对江苏省委（以彭冲、许家屯等老干部为首）的联合阵线。其中发挥骨干作用的，有南京造反派头头曾邦元、苏州造反派头头华林森和徐州造反派孔庆荣等人。曾邦元原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团总支书记，“文革”初期卷入造反运动，后来成为“南京八二七”的主要领导人。1968年“大联合”时，他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宣传组副组长（相当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0年重建中共江苏省委时，他又被任命为省委委员。1971年，他因“五一六”问题受到隔离审查，直到1974年才平反获释。后来省委分配他赴苏北某县工作，引起他的严重不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再次成为南京造反派的领军人物。华林森原为苏州长风机器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他在“文革”初期卷入群众造反运动，后来成为苏州“支派”头头。江苏实施“军管”后，他领导的“支派”支持当地驻军领导人，因而不但没有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清洗，而且在党政官僚体系中步步高升，直至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成为苏州仅次于军方领导人的二号人物。其他许多“支派”头头也在当地各级权力机构中占据要津。1974年军方势力退出地方事务后，华林森实际掌握了苏州市党政大权。为了巩固其地位，他在造反派中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责令华林森停止“双突”，同时派出刘伯英等一大批老干部全面接管苏州的党政工作。华林森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听候处理；其他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则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劳动锻炼”。苏州造反派头头们与省委的矛盾因而空前激化。孔庆荣也是一位老工人、老党员、老劳模。徐州的“文革”群众运动兴起后，逐渐形成了“支派”和“踢派”两大群众组织。孔庆荣选择站在“支派”一边。当地实行“军管”后，“支派”积极与军方合作，通过武力镇压方式建立了一派掌权的政治格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长期蛰伏的“踢派”再次揭竿而起，向“军管”当局及其政治盟友“支派”发难，使得当地的派性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一些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因利害攸关，也在暗中推波助澜。江苏省委派去接管地方党政工作的老干部汪冰石等人根本无力控制局势。由于徐州是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煤炭生产基地，当地持续不断的派性斗争对国民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因而在1975年春夏成为全面整顿的重点之一。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苏省委与铁道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徐州，采用铁腕手段重建秩序。两派的重要头头均遭受打压，少数人还被判刑入狱。长期在当地掌权的“支派”成为全面整顿的最大牺牲品，因而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和具体实施徐州整顿的省委主要领导人极为怨恨。（11）

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全国范围的运动走势再次发生逆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各自为战的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造反派头头们联合起来，紧紧抓住所谓“苏州问题”和“徐州问题”向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发难，成为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主要动力。在“南京事件”被中央定性为“严重政治事件”后，他们又四处活动，积极收集和整理“南京事件”的材料，通过各种途径与当时把持中央大权的“四人帮”建立联系，希望将彭冲、许家屯打成“南京事件的黑后台”，进而推翻老干部们在当地的统治。（12）

由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文革”后期当地派性斗争的发展脉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后期派性斗争与“文革”前期派性斗争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由于造反派头头们已经在1968年的“大联合”中融入了党政官僚体系，因而其后的地方派性斗争本质上是党政体制内的权力斗争。然而与“文革”前期派性斗争的相似之处是，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各方的派性身份、

个人处境和政治抉择之间依然存在着十分清晰的内在关联。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老干部群体和原造反派头头们对1976年春天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微妙态度。1976年春爆发的自发群众运动，反映出广大民众在历经“文革”动乱后的幻灭与觉醒。他们固然对“文革”前的官僚政治体制心存不满，然而“文革”期间的种种亲身体验告诉他们，相比于官僚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而言，中央高层中少数极端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危害更大。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摆脱少数极端势力的控制，实现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背景下，这样的政治诉求只能以某种曲折的、象征性的方式——如不顾“四人帮”禁令自发“悼周”、扩散所谓“总理遗言”（实为抵制“批邓”）、公开批判《文汇报》、以及在中央“四一指示”后继续以“悼周”名义进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等——表达出来。当时的省市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与沉浮，后来侥幸重返领导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广大底层民众的情绪与诉求感同身受，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心存同情，加上他们在1975年领导实施了当地的全面整顿，因而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态度消极。但这样的个人情感，并未阻止他们在中央对“南京事件”做出明确定性后，积极地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实施镇压与清查。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表现激进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内心深处未必对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没有看法，未必对自发的群众运动没有同情，但为了改变自身的现实处境，他们不得不借助于新的政治运动，极力攀附当时大权在握的“四人帮”。他们积极介入“南京事件”的清查，不断向北京报送各种“黑材料”，但他们真正的政治对手，并不是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而是那些掌握地方党政大权的老干部们。无论是揭发批判“苏州问题”和“徐州问题”，还是高调鼓噪揪出“南京事件的黑后台”，都旨在抹黑当时的省市领导人并将其打倒。

由此可见，在集权政治模式下，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直观地反映他们的真实情感与主管意愿。最高当局乾纲独断所造成的频繁的政治反复，不断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制造着分化和对立，并迫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不得不追随着变幻无常的政治潮汐，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扮演自己必须扮演的角色，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因而卷入矛盾冲突的各方，都很难简单地用所谓“好人”或“坏人”概念一言以蔽之。

### 三、对两种现有相关解释体系的批评

迄今为止，在理解和诠释“文革”派性斗争问题上，“社会冲突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是国内外学界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解释体系。

社会冲突理论，是上世纪中后期由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解释模式。Gordon White、Hong Yung Lee、Anita Chan、Stanley Rosen和Jonathan Unger等人是其代表。简单说来，他们认为在“文革”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和对立，一些人从现行体制中得到好处，而另外一些人则受到现行体制的排斥，因而“文革”运动爆发后，前者便成为“保守派”，后者便成为“造反派”。此后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组织名称如何演变，派性斗争的基本格局和性质不变。（13）笔者认为，社会冲突理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其立论基础仅限于1966年下半年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派性冲突，而没有意识到此后政治潮流的多次逆转而导致的派性阵营分野和个人派性身份的发展嬗变。本文的概述显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当政治潮流发生逆转时，每个人都会面临一次新的选择。因而派性阵营和个人派性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结果，一些政治背景相同的人因随机选择而加入不同阵营，而政治背景不同的人因利害攸关而结成联盟，便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此外，人们的派性身份有时会显得十分模糊，或者同时具有多重的派性身份。

利益集团理论，是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模式。这个解释模式的始作俑者是 Charles Tilly 和 Doug McAdam。他们的著述对具有相同利益诉求和身份认同的社会团体实施政治动员、形成政治运动的情况，有非常精妙的论述。(14)稍后，他们的相关论述被 Hong Yung Lee 等人引介到“文革”研究中来。(15)简单说来，这种解释模式主要依托西方的政治学经典理论，认为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特有的利益诉求，造成了“文革”期间的派性冲突。换言之，“文革”期间的派性冲突大体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不过是以一种不太成熟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源自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原本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常识。然而用“利益集团”理论解释“文革”派性问题，完全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阶段属性。毛时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宪政国家。导源于宪政并受制于宪政的“利益集团”概念，在中国很难找到对应的实体。这不是说中国社会中完全没有利益集团存在，而是说中国社会中利益集团的界限十分模糊，严重缺乏约定俗成的规范。比如党政干部(civil cadres)群体可以被看做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但是当群众性的“造反”、“夺权”运动发生后，这个利益集团便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职业军人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但是各地实行“军管”后，这个利益集团的原有属性便因全面介入地方党政事务而在顷刻之间发生改变。学生造反派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可以使他们在顷刻之间变成“农民”。许多造反派头头原来不过是“学生”、“工人”、“农民”这些特定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是到“大联合”时，他们在顷刻之间便转而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由此可见，由于利益集团并不恒定的存在，因而也就无从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

质言之，“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中的基本政治关系，并非众多体制化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多元关系，而是弱小的“个人”与强大的“国家”(实际上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二元关系。无论你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属于哪个单位，是否担任领导职务，在“文革”期间都置身于类似的政治处境，面临着类似的政治压力，并遵循类似的逻辑做出个人的政治抉择。正因为如此，“文革”前期各地相互对立的两派阵营中都包含学生、工人、党政干部和军人。由此可见，群众派性的形成，往往不是集团利益相互冲突的结果，而是个人受政治形势裹挟的产物。

系统地深入考察1949年以后至“文革”前期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问题是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之一。首先，集权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派性政治，它通过宗派主义的方式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套用“大右派”储安平的一句话，毛时代中国政治中最大的宗派主义，就是“党”与“非党”的分野。其次，要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稳固统治，当权者的政治策略之一就是人为地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对整个社会分而治之。在“文革”初期，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的最初形成，肇始于一些基层单位领导人动员多数群众围攻镇压单位内部的少数异见人士。而后，工作队领导人、地方党政领导人和介入“支左”的军队领导人均纷纷沿用这样的做法，从而使得群众派性斗争不断扩大，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

#### 四、关于“文革”运动的整体反思

对江苏/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深度研究，不但使笔者对群众派性问题形成一些新的看法，而且进而影响到笔者对“文革”运动的整体认知。这里简单归纳如下：

第一，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文革”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与此前和此后的中国政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以前对此没有充分的认知，正说明我们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和解释还十分肤浅。

第二，由于数以万亿计的人卷入了这场运动，所以我们很难用某种单一的解释模式对人们卷入的动机一言以蔽之。不过笔者的研究表明，许多人最初投身“文革”运动，不是源于政治激情而是源于政治压力。这说明在集权主义政体之下，人们其实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他们只有表现出应有的“革命激情”和激进姿态，才能使自己避免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换言之，他们投身“文革”运动的原始动机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失去什么；不是为了进取，而是自保。套用一句军事术语：主动进攻往往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地的“文革”运动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哄而起。

第三，那些深度卷入地方派性斗争的人，如那些著名的群众组织头头，那些曾经执掌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以及那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而后侥幸重返领导岗位的地方党政干部，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很难摆脱派性因素的考量。因为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政治框架下，“赢家通吃”是政治游戏的重要规则之一。所以掌握权力的一方，要尽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权力；受到压制的一方，要尽一切努力实现咸鱼翻身。为了在派性争斗中取胜，一方面，他们会积极争取中央高层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考量，对中央的各项指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诠释与发挥。娴熟地运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极力抬高自己、抹黑对方，是“文革”期间派性斗争的一个基本策略。这样的政语策略，常常导致一些不谙内情的旁观者和研究者混淆了“文革”期间派性斗争的本质属性。

第四，如果我们将“革命”定义为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或断裂式的发展，那么无论是从“精英政治”层面还是从“群众运动”层面看，“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文革”期间政治实践的基本特征，依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场运动之所以使人产生一些关于革命的联想，是因为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们不约而同地策略性地运用了许多激进的革命修辞。

注释：

(1) 详见严家琪等：《四五运动实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Louie, Genny, and Kam Louie, “The Role of Nanjing University in the Nanjing Inciden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86(1981):332-348.

(2) 详见 Heilmann, Sebastia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The China Information*, Vol. 8(1993-1994):1-19. 吴雪晴：〈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百年潮》2002年第8期，页18—24。程中原：〈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战——1976年：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页67-81。

(3) Dong Guoqiang, “The First Upris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Dynamics,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3(2010):30-49;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2011):1-26.

(4)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3(2010):675-692.

(5)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2011):425-447.



(6) 同上。

(7) 同上。

(8)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The China Journal, No. 68 (2012): 1-31.

(9)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2 (2012): 893-918.

(10)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g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The China Quarterly, forthcoming.

(11) 同上。

(12) 同上。

(13) 详见 Gordon White,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1980): 397-466.

(14) 详见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8) 和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5) 详见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 和 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 原载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14年6月号

~~~~~

## 【文革一幕】

陆平、彭珮云是怎么“解放”的

• 钱 江 •

1966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将他们直指为“黑帮”进行批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6月1日晚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一时轰动全国。

这张大字报是得到领袖钦点的，被视为“文革”楷模，被点名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受到残酷迫害。

◇ “第一张大字报”点名的三人均遭迫害

这张大字报标题排名有些蹊跷，将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列名第一，实际上北京

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1914—2002）的职务更高。副书记彭珮云虽然年轻，党内资历却不在宋硕之下。大字报作者项庄舞剑，剑指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因此就作了这番手脚。

在残酷的“文革”中，宋硕（1923—1969）第一个倒下了。他原名钱宗澜，1945年在北京大学化工系读书时加入中共，经历北平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被“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后，宋硕遭受关押，多次在上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上弯腰挂牌、遭受批斗，五个子女或下放农村、或流浪街头。他在监禁中患上肺癌，1969年10月30日含冤去世，年仅46岁。

宋硕去世后，陆平成了被“大字报”批判的“领衔人物”。

“文革”前三年中，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清华被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控制，私设公堂，监禁和殴打两校的干部、教授。陆平首当其冲，被长期监禁，审讯得没完没了，受到多次吊打。彭珮云是女性，被失去理智的“红卫兵”殴打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卧床不起，多日才缓解，同样被长期监禁。

1968年7月28日，领袖无法容忍北大、清华的混乱状态，命令工人宣传队在军队支持下进驻两校，结束了那里由年轻“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情况。此后，陆平、彭珮云被解除单独监禁，关进集体大“牛棚”，和诸多“黑帮分子”一起劳动改造。

进驻北大的工人和军队“宣传队”执掌领导权，来自部队的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有荣长风、局成俊、魏秀如（女）、华广信、焦克琛、李景斌（除荣长风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军代表外，余五人均为工人）。

这个指挥部进驻北大后，一方面制止了大规模学生武斗，一方面奉行“文革”的错误指导方针，进行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大量冤案，以致命案频发。这说明这些指挥者不能胜任管理北京大学的使命。

1969年3月24日上午，81名来自“8341部队”的军宣队员由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进驻北大，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其中包括了迟群和谢静宜。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王连龙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在此之前，从1月开始，身处“监督改造”中的陆平和彭珮云的情况有所改善，每月暂发生活费40元，未成年子女可从工资中支取15元。

北大革委会成立后一个月，陆平、彭珮云被遣送江西南昌郊区鄱阳湖畔刚刚兴建起来的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不再单独监禁，随干校学员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那里，陆平的健康被摧残了，一度病危。彭珮云比较年轻，健康也大受损害。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领衔“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经失势，也被遣送到鲤鱼洲劳动。

鄱阳湖畔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数百名北大、清华的教师因此患病。为免于这支队伍全军覆没，该干校于1971年9月撤销，陆平、彭珮云回到北京。

陆平的身体已难以支撑，只能在家养病，健康逐渐恢复。彭珮云被送入北大新设的大兴县“天堂河”干校继续劳动。此时，对他们的“监管”明显松弛了。

陆平、彭珮云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历史清楚，“造反派”找不出毛病。

#### ◇ 饱受煎熬中的漫长等待

这时，北大校内秩序逐步恢复。1971年5月，北大成立党委，杨德中任书记，王连龙、刘信、田双喜、张学书为副书记。到9月，杨德中调回部队，王连龙主持北大工作，并于1972年2月成为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从1973年起，北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逐渐开始。先是校党委于1月批准，将“文革”开始后定为“叛徒”的副校长黄一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仍开除党籍（“文革”后黄一然被彻底平反），又宣布“解放”原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同时还宣布，将聂元梓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群众监督”。

这样一来，陆平、彭珮云一案将趋于“解放”就露出了势头。

这年3月，彭珮云的丈夫王汉斌被确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山西潞安县放逐地回到北京。由此，彭珮云被允许每两周可在周末从干校回家一天。

这时，王汉斌和彭珮云在北京已经没有了家了。他们两人来到彭珮云的妹妹彭静云家中见面，看望上中学的小女儿王薇。这是夫妻两人自“文革”爆发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团聚，相见时既兴奋又伤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欣慰的是，王薇长大姑娘了，学习努力，品行优异。不久后，王汉斌分到北京和平里的一套两居室房子，这对夫妇才重新有了在北京的家（2011年12月30日在北京采访彭珮云的记录）。

北大的老干部、老教授一个接一个“解放”，恢复了工作和教学，陆平和彭珮云还在艰难等待。他们两人遭受如此磨难，由聂元梓担纲的大字报当然厥功至伟，关键之处在于领袖毛泽东支持了这张“大字报”。聂元梓倒台后，能不能解放陆平和彭珮云？执掌北大事务者总在犹豫。

#### ◇ 曲折迂回，终于得到可以解放的准信

1974年国庆节前夕，原教育部长蒋南翔在周恩来过问下获得“解放”，于9月30日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国庆25周年招待会。蒋南翔重返政治生活，直接推动了陆平、彭珮云一案的解决。

1974年11月15日，北大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了陆平、彭珮云的材料，将他们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走错了路的问题，决定予以“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

但是，会议的主持者还多一个心眼，先一步解放被“第一张大字报”最后点名的彭珮云。北大校党委在11月16日向北京市委报送《关于解放彭珮云和恢复其党组织关系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彭珮云被“解放”了，使陆平和家人看到了希望。

陆平是当年的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社会影响更大。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倾向于解放陆平，但觉得要解放陆平，没有领袖指示不行。他即刻灵机一动，想到北大历史系有两个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女学生，假日里经常回到中南海去，她们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原本来自中南海警卫部队的王连龙马上找来她们两人吩咐，如果你们有机会见到主席，要相机请示如何解决陆平的问题。

那两个女学生果然很快就做到了。她们从中南海回来，向王连龙汇报说，见到主席了，转达了北大的请示，主席答复说：“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有了来自领袖的指示，北大负责人要解放陆平就算心里有底了。校党委于11月25日向北京市委提出解放陆平、恢复他党组织生活的报告，报告直接引用了从领袖那里传来的原话：“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既然天降纶音，其后顺理成章，九年前被“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倒的陆平历经折磨，于1975年4月获得“解放”——解除“群众专政”，恢复组织生活。

此时，仍在北大执掌大权的迟群和谢静宜威风不减，他们将彭珮云召来办公室谈话，对她说：你还年轻，要好好改造。因为你还是有错误的，更要好好改造。

谈话气氛很不融洽，迟群、谢静宜的话使彭珮云很反感，彭保持沉默。迟群、谢静宜接着宣布，分配彭珮云到北大政治部政工组，做一般事务工作，主要做文书收发。

陆平具有更长的革命资历，又是北大前任书记，北大已经不好安排他了。当年7月，陆平就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文革”终结后，彭珮云担任了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注）。

2014年7月10日于北京

注：为陆平、彭珮云一案彻底平反是“文革”后的1979年2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

《陆平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 原载《世纪》2014年6期

~~~~~

【荒唐年代】

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 黄 华 •

一：强送毛泽东像章、语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

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短短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后来在会见周总理时说，他也曾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他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依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当时受到两次冲击，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再就是外电传有人问周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时，周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周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 二：火烧英国代办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

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許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锥、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

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

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竣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 三：使馆的雕塑也要“破四旧”

1954年春，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调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为欧非司司长，从此更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形势。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于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埃及于1958年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埃及仍称为阿联。它于1971年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3月28日，我向



纳赛尔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我国于1956年5月同阿联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陈家康同志。1966年5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正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通知还说，“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权。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们使馆党委开会作了几次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6月上旬，我们从信使带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于8月7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此时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议要求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后极“左”风暴在全国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规模展开破四旧活动，出现了种种违反法制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抄家、体罚、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被揪斗游街，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人们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他们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里来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我和使馆的参赞们都不赞成，因为当时这一群塑像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尽管是在官邸院内，但过往行人隔着栏杆都能看得见，有人还驻足欣赏。打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失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有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之，在一天夜里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那时候使馆同志随国内的做法，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手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我也引用小红书的有关段落说：“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总之，各取所需。

红卫兵的行动迅速传染到国外，一些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闹事，国际影响很坏。在国外的极左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涉外事件，对外交工作十分不利，记得是1967年2月7日，我馆接到国内的电报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驻外使领馆的每个同志都要在这场革命中得到锻炼，中央认为，不宜在国外使馆进行文化大革命，使馆党委应安排馆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一指示，使馆党委经研究决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参赞带领二十几位同志第一批回国，我作为第二批人员回国参加革命。使馆约一半人员在何功楷参赞带领下回国参加文革后，使馆较平静，干部情绪也略为稳定一些。

在使馆，我想应该怎样把留馆同志的情绪引向积极实际的方面去呢？我提议大家用劳动来抒发我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决定扩建使馆内过小的电影放映室和使馆大门口的收发室，这样，放映新的电影片时，可以多请一些外国朋友来观看。正好这时有自索马里回国的援建施工队的几名技术人员在开罗滞留，便请他们带领使馆人员施工，他们满怀热情投入扩建工作。使馆全体人员也很高兴抽时间参加劳动。不巧的是才干了几夭，我在向天花板上

抹水泥时，腰痛病犯了，疼痛难忍。我休息了几天后又加入施工队的行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电影厅和收发室扩建工程完成了，室内陈设也焕然一新。全馆同志都赞赏这个宽敞美观的电影厅，收发室也由一大间扩展为两大间，有了回旋余地。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甚至殴打。据说6月间，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要求把我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况且，埃及和以色列刚刚发生了六·五战争，有许多事情需要联系交涉。两年后即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催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我于1969年夏末奉调回国。

1967年初，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各省市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制造安亭事件后，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工总司在人民广场上开了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并宣布由造反派掌握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领导权实际落入张春桥、王洪文手中。之后许多省市相继被夺权，只有广东省的书记主动交权，这名书记在众多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这一年的2月份，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进行猛烈的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要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数千人的批判陈毅的大会。据说，当时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被周总理严辞驳回。他说，假如你们要揪斗他，我就会躺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胸膛上踏过去！我深感周总理卫护战友的赤诚之心和主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

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也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口号：打倒陈毅，大家举手跟着喊。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我：“黄华，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领头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向我施压。我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我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决不举手打倒陈毅。

陈毅同志是1923年的党员，是党和红军的老领导人之一。他于30年代在江西苏区坚持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抗战开始后组建和担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海战役中战功显赫，他随后挥师南下，解放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任市长。从1954年起，他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我在美军观察组工作时，他曾到王家坪来介绍新四军的情况，深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和赞赏。日本投降后，我陪同他们乘飞机到黎城，看到他总是那样乐观和幽默，谈笑风生。解放后，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我们常在市委开会，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1964年他陪总理来加纳访问，他的大度和机智使加纳人折服。我一直敬爱他。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领导人，我对他深信不疑。

1967年8月，外交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到外交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领导瘫痪一个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极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极坏，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时，从国内又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的有些馆

员也要仿效。有一个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我说，今天晚上我要会见华侨代表，欢迎你们监督。又有一次，他们要监督我同一个外国朋友的会见，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几次不合作的表现，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们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对我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我回答说：“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

#### 四：接线员痛骂苏修头子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这一提法将世界革命目标与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基本正确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革命战争万岁》一文却做了错误的解释，该文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分析，文章牵强附会地认为亚非拉国家是世界的农村，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亚非拉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像中国人民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是进行外交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国与北美、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指责，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动出现停顿甚至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在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大量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延误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谓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论的同时，极左分子还极力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的路线。“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在否定过去17年外交路线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时，他们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称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同时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外交工作领导干部都成为他们斗争对象。在造反派对外交部严重冲击下，外交部已经不能正常办公，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

尔提出书面抗议了。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出现伤亡事故。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还以国家名义公开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关系才消除紧张局面。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是缅甸的蒋介石。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一方面，缅甸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为此中国撤走了412名援缅专家；另一方面，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周恩来对此分析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这种现象怀着极大的不满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这样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才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在周总理批评造反派制造火烧英代办这样的荒唐事件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和红卫兵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这位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共和国总理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我们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我们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暂时的困境，当时已经与我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外交工作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的恶劣情况。

对于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扭转了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要求在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人员的组织纪律性。毛泽东于1968年5月严厉批评了类似“世界中心——北京”这样惟我独尊、狂妄自大的错误提法，以及“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要求注意在外交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专门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

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随后，我国开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并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并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同南斯拉夫停止了相互指责，签定了贸易协定，恢复了互派大使；中国改善和加强了同朝鲜的关系，当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入侵朝鲜领海并被朝鲜海军扣留事件时，中国政府于1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立场和做法，随后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互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友好关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建交高潮，先后有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经过努力，我国及时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 摘自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